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学术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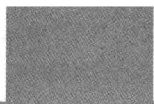
鲁迅文化观 略论

Brief Study on Lu Xun's
Cultural Outlook

雷世文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鲁迅文化观 略论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文化观略论/雷世文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 7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术论丛)

ISBN 978 - 7 - 5008 - 5020 - 5

I. ①鲁… II. ①雷… III. ①鲁迅 (1881 ~ 1936) -
文化思想 - 思想评论 IV. ①I210. 96②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256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120

电 话: (010) 82075935 (工会与劳动关系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4002 62033018 (读者服务部)

购书网址: <http://ghyldgx.taobao.com>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7.2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精英文化观	29
一 精英文化之选择	29
二 “立人”探索	31
三 造就英哲之士	35
四 境遇的焦虑	38
第二章 图画媒介文化观	42
一 图画的文化分析	46
二 图画的认识价值	56
三 图画艺术观	70
第三章 学术文化观	80
一 识断与眼光	81
二 学术研究方法	86
三 学术致用	93
第四章 言语媒介文化观	98
一 “说”的禁忌	98
二 说真话·说谎话·说不清	107
三 想·说·行·写	114

第五章 自审的文化观

——以《野草》为中心	120
一 人格意志	120
二 黑暗与虚无	123
三 反抗绝望	125
四 孤独意绪	129

第六章 女性叙事的文化诉求

——以杂文文体为中心	133
一 女性形象类型	136
二 女性身体叙事	139
三 女性文化叙事的修辞指向	142

第七章 流氓文化批判观

一 流氓之道	146
二 流氓相	153
三 流氓术	160
四 流氓变种	172

第八章 文本的文化隐指

一 小说文本的文化张力	177
二 文学创作的起源叙事	183
三 与母亲书	186
四 古镜背后的文化	190

第九章 “韧”性文化人格

一 “韧”性人格图景	198
二 “韧”的意志维度	202
三 “韧”的战斗哲学	213
四 “韧”性人格的形成因素	217

五 “韧”性人格价值	220
第十章 “反现代”的文化症候观	222
一 新的奴役关系	224
二 专制文化	227
三 染缸文化	231
第十一章 媒体批判文化观	234
一 媒体“伪自由”	235
二 媒体暴力	237
三 媒体商略	239
四 宣传即做戏	241
第十二章 向死而生的文化选择	244
一 死亡意识	244
二 拒绝宽恕	248
三 告别左翼	251
结 语	254
参考文献	265
后 记	269

导 言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最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怀鲁迅》

探讨鲁迅的文化观构成，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一个时势的问题。俗话说，时势造英雄。鲁迅就是近现代交替的大变迁、大动荡时期，诞生在中国人中间的文化英雄。因此，考察鲁迅的文化思想就离不开中国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这样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中看鲁迅的文化思想，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问题的产生在于，离开了鲁迅文化思想发生与形成的彼时彼境，在后鲁迅时代的此时此境中，该如何看待鲁迅文化思想的价值呢？真是像有的观点认为的那样，鲁迅的文化见解已经过时了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回到中国的文化现实中来，检验一下鲁迅所批判过的东西是否还活着，如果鲁迅所批判过的东西依然存活着，鲁迅的文化思想就依然有着生命力；如果鲁迅所批判过的东西已经灭亡，这说明鲁迅甘愿与时弊偕逝的愿望已经实现，这就从另一个层面表明了鲁迅文化思想的革故鼎新的价值。在此，只要返观一下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我们就不难发现，鲁迅当年所批判过的东西并没有消失，而是依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比如中国人的缺乏公德心，这是众所周知的，“一说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尘灰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

都得不到。”^① 这是社会学家费孝通 1940 年代在西南联大讲授“乡村社会学”时说的一番话，其对中国人缺乏公德状况的观察无疑是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时光流逝到 21 世纪，中国人的公德心有了显著地提升了吗？没有。我们只要经常留意公共场所的设施就能发现，没有一样东西能保持完好，路灯、扶手、电话插卡口端、草坪、开关按钮、电脑等等，凡是姓“公”的，面貌和命运都不尽如人意。我们在各种公共场所，公园、车站、码头、图书馆、公共厕所、车厢内等等，经常会目睹大量的公物被损坏的景象。所有的这些现象，我们都可以把它置入到鲁迅的批判话语体系中，鲁迅早在 1925 年就曾对中国人缺乏公德状况进行过严厉地批判，他指出：“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深刻的，就因为“私”利意识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并演化为民族的集体行为，所以防不胜防。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看，“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② 这一毛病在当代中国的恶性泛滥进一步证明了鲁迅思想并没有失去“时势”价值。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出现了惊人的流失，仅在 1982 年到 1992 年间，国有资产流失就高达 5000 多亿元。^③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很多，但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者缺少公心，私欲过甚，所以造成了国家资产的流失。有些国有资产的流失，“绝非各级国有资产管理者的缺乏管理经验，相反倒和部分企业负责人积多年管理经验，精通在国有企业中如何钻空子去巧取豪夺有关”。^④ 有的企业责任人为了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公开侵吞国有资产，“企业亏损，经理发财”，“富了和尚穷了庙”，成为普遍的现象。一些工商企业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23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24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③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106 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④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107 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明明知道所购原料、货物是残次品，却按正品价格购入，明明是优质畅销品却低价脱手，慷国家之慨，得个人之实惠”。^① 还有一些企业领导，贪污受贿，用公款吃喝玩乐和进行个人消费，把国有企业当做自己的私人企业，大量安插自己的亲属、朋友，形成特殊的裙带利益集团。最奇怪的是社会无业人员也参与到了侵吞国家财产的行列中来，他们以所谓“能人”的身份，采用投机取巧的手段混进企业后，就大肆挥霍侵吞国有资产。这些无业人员侵吞国有资产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一是这些人带着贪欲而来，时刻虎视着国有资产。二是侵吞手法更加狠毒，不顾后果。三是对企业没有法律责任，对企业行为也极不负责，问题发生后也难追究，结果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② 对于国有资产触目惊心的流失，用鲁迅的话来解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那就是：“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国有资产就因为姓“公”，所以受到各色“外行”和“内行”的蛀虫的吞噬，假公济私也好，损公肥私也好，总之是“公仓”的东西流入了“私囊”。我们由这里可以看出，鲁迅的思想和中国当代的经济现实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批判性的同构关系，只要用鲁迅思想的光焰来烛照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现实，那些阴暗的鬼魅便即刻现出原形，鲁迅思想的武器的功效依然是那样的卓著。

鲁迅一生都在批判瞒和骗的中国文化，可是这种瞒和骗的文化非但没有绝迹，反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中日益猖獗地活跃着。我们身边的假冒伪劣商品为何总是不断出现，屡禁不止，政府打假和消费者投诉都不管用，这是因为瞒和骗是一种文化遗传，这种遗传与经济市场结合又形成了利益链，结果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根本杜绝不了。瞒和骗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生活之所以广泛存在，其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③ 正是在这种骗子心理的作用下，名目繁多的骗术开始粉墨

①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110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②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115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③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184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登场了，有“移花接木，假冒或借用他人名义或货物，骗取对方信任”者，有“利用广告、信函、传单等媒介，散发虚假信息”者，有“虚构货源，伪造文书”者，有“恶意串通，骗取对方财物”者^①，这些欺诈手段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给受害当事人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还有大量事实表明，“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到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② 要从根本上防治骗术，使经济伦理关系回到健康的轨道，我们就还需要再一次从鲁迅的立场出发，“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坟·论睁了眼看》），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二心集·习惯与改革》），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抓住问题，推进改革。而反思这些年来的改革，我们确也发现，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学者“并正视而不敢”，“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坟·论睁了眼看》）。有的甚至采取了粉饰的态度，眼睛一闭“便看见一切圆满”（《坟·论睁了眼看》），做着黄金世界的理想，知识分子的正义和勇气在他们身上已经消失，“我们的许多教授、学者们已开始踱进贵族之屋，渐渐地雅化了，以精神委顿之状，迟顿于社会的矛盾，对身边的荒谬、惨烈往往视而不见，悠悠然摆出一种名士的样子。学界的堕落，不是近年才有的事，遥想当年鲁迅对正人君子之流的讥刺，当深感历史进化的迟缓。人间痼疾如此深地纠缠着世人，谁说鲁迅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呢？”^③ 鲁迅的思想的确不过时，其思想遗产在今天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他揭示了历史和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合法化知识与不平等关系的隐秘的联系，他的思想遗产应该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思想的重要源泉。”^④ 特别是在中国的当代情境和知识状况下，“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规则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中，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对文化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

①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185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②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181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③ 孙郁：《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序二》，见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

④ 汪晖：《反抗绝望》，3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都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①，这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

我们说鲁迅的思想活着，不仅是站在中国立场而言，就是立足国际文化来看，也是如此。在西方英语世界，发达国家的知识界在 1949 年以后对鲁迅一直保持着不衰的关注，“优秀的译文，尤其是英译，极大地诱发了人们对鲁迅作品的兴趣”^②。鲁迅不仅成为西方汉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而且在西方国家得到不断地普及，“鲁迅及其作品介绍给一般读者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把西文的译作看成是普及性作品，* 因为它们阅读对象是不懂中文的读者。译作的前言往往要介绍作者及其生活时代的背景资料，介绍被译之作的文学价值，或解释译作对要出版它的国家的重要意义。另一类普及作品是，专家或非专家发表在通俗或半通俗刊物上的消息报道性或批评性文章。这类文章常常讨论作者的作品，阐释其对世界文学的意义，或者把鲁迅之作与其他作者的作品比较”。这与社会主义国家对鲁迅的普及路子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国家注重宣传，他们显然是想塑造一个怀有无限革命热情的作家英雄形象，作为艺术家和人的鲁迅则谈得稀少”^③。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间，“把鲁迅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试图在世界文化语境中来理解鲁迅，并将鲁迅作为‘他者’，并从这种与‘他者’的对照中重新认识自己”，已是一种新的觉悟。而“把鲁迅创造的文化遗产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参与对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则是“西方世界的一种更普遍的共识”^④。由西方“英语世界鲁迅”转向日韩学界视野中的“东亚鲁迅”，我们看到的是鲁迅传播的另一种生动景象。日本学者丸山昇在 2001 年所作的一次演讲中称，鲁迅的思考方法和行动样式“有助于我们以后正确对待将发生于二十一世纪的复杂问题”，鲁迅在人类的又一个新的世纪依然“带有新的分量、新的内容”。丸山昇的观点是在对 20 世纪人类文化进行考察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

① 汪晖：《反抗绝望》，37 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② [以] 伊琳·艾勃：《欧美对鲁迅的接受——普及与学术研究的动机》，见乐黛云主编《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411 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③ [以] 伊琳·艾勃：《欧美对鲁迅的接受——普及与学术研究的动机》，见乐黛云主编《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419 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④ 乐黛云：《鲁迅研究——一种世界文化现象（序）》，见《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在他看来,20世纪是一个复杂的世纪,“言论、信仰等的自由权,不仅有些国家由于各种原因还根本不承认,连原则上承认‘自由权’的国家里其实现的程度也还不够,常常受着有形无形的威胁”,20世纪所发生的历史悲剧“不仅破坏了人们的幻想,使他们知道‘理想’本来有往往化为‘幻想’的危险,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结果。那就是人们找不出代替的新的‘理想’、‘理论’,似乎丧失了对‘理想’、‘理论’本身的信赖”,特别是“在人们好像对一切思想、理论失掉了信仰似的现在”^①,鲁迅的思想和话语仍旧具有指导价值。丸山昇的见解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立足中国与世界的精神危机背景来看待鲁迅的。理想与信仰的缺失,不只是亚洲的问题,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鲁迅遗产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为人类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启发。在东亚看鲁迅,日本和韩国对于中国具有同样的地缘意义。韩国与鲁迅的直接缘分虽然较为薄弱,但作为观照鲁迅的一个视角,韩国知识分子的眼光是有着别样的参照意味的。韩国学者朴宰雨曾指出:“鲁迅是20世纪东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思想的、文化的、人物的资源。他虽然首先是属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但又是属于东亚的知识分子。他是在现代东亚知识界里一直受瞩目的文学家兼思想家,是一位很难再有的历史文化向导。为东亚文学、东亚文化的未来,在东亚知识分子互相进行对话的时候,鲁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里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鲁迅的“东亚化”已经成为东亚知识分子对话的媒介,“身为东亚人,现代东亚能拥有一位鲁迅,我们可以引为骄傲”,“在东亚知识分子之间互相比较文学与文化,沟通思想感情,交换意见,提高认同感的时候,鲁迅是最有效的一个环节”^②。从朴宰雨的这些言语里,我们不难感受到韩国学者对鲁迅怀有的虔诚之情。这份虔诚之情,在“韩国思想界的恩师”李泳禧的身上同样表现得真挚动人,在《鲁迅与我》(1988年)、《对三十年笔耕生活的回顾》(1990年)、《从鲁迅看今天的我们》(1991年)、《吾师鲁迅》(1995年)等文章中,李泳禧表示自己的文章在思想上、在文笔上与鲁迅是相通的,他的著作和思想能对韩国知识分子和当代青年们产生影

① [日] 丸山昇:《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载《鲁迅研究月刊》,4—7页,2004年第12期。

② [韩] 朴宰雨:《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序一》,见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

响,“那只不过是间接地传达了鲁迅的精神和文章而已”^①。李泳禧曾这样描述他与鲁迅的精神相遇,他说在读到鲁迅的《呐喊·自序》中的“铁屋子”比喻时,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顿时领悟到了我应该干什么,并立刻下定了决心。我人生的方向和目的便在一瞬间被决定了”^②,并且他指出,“在阅读鲁迅众多的著作时,我为将思想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所感动。我否定了那些安居于‘买卖知识商品’的教授、技术人员、文艺作家的生活,开眼于与受苦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义务’,这些苦难,当然是由于不正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这样的义务感则出自于‘对人类之爱’”^③。从这些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鲁迅对李泳禧的人生目标和思想归宿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与鲁迅发生精神共鸣的韩国知识分子代表还有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任轩永,他对鲁迅给予自己的精神滋养有过这样的表述:“我行动的指针仍是鲁迅。许多革命家或变节投敌,或最终遭遇不幸,而鲁迅几乎是完好无损地将自身作为革命的火花一直燃烧到生命的尽头。我仰慕他的大智大勇。鲁迅为了文学而不畏政治斗争,为了政治而自由自在地运用文学这一武器,甚至于为政治评论而创造出独特的‘杂文’形式。打破文学家只能用文学进行斗争的通例的,就是鲁迅。这正是鲁迅教与我的。高尔基、海涅没能做到的,鲁迅做到了。”^④这里所透露的与鲁迅精神的契合点依然是十分独特的,那就是鲁迅的思想赋予行动的实践理性精神。以李泳禧、任轩永以及朴宰雨为代表的韩国知识分子并不是抽象地接受鲁迅,他们更看重的是把鲁迅精神运用于社会实践,“对韩国的黑暗现实起到矫正作用”^⑤,对“构筑东亚和平体制、相生机制、生活共同体”起

① [韩]李泳禧:《吾师鲁迅》,见朴宰雨《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收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110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

② [韩]李泳禧:《鲁迅与我》,见朴宰雨《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收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110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

③ [韩]李泳禧:《自由人,自由人》,见朴宰雨《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收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110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

④ [韩]任轩永:《鲁迅之于我的影响》,见朴宰雨《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收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114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

⑤ 这是李泳禧在1999年12月2日接受朴宰雨的采访时所说的。见朴宰雨《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收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116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

到“连带、团结”^①的作用，他们对鲁迅的理解充满了指向未来的前瞻性，正如任轩永所说的，“21世纪将‘民族解放论’丢入历史的垃圾箱，大概是致力于传达‘全球化’这一福音的时代吧。如果鲁迅能够在这个世纪复活，他有何可言呢？对于落后的民族、弱小的民族来说，失去民族主体性的‘全球化’是否可行？这种东西鲁迅是不会予以赞同的。我相信，21世纪的东亚将重新需要鲁迅。”^②这里对鲁迅在21世纪存在价值的肯定，很容易使我们回到日本学者丸山昇的立场上来，日韩两国学者对鲁迅价值的定位，其眼光不约而同地指向新的世纪，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两国学者对鲁迅的接受其实是有着一种内在的同一性的。我们在此看到，鲁迅遗产不仅属于中国人，而且属于东亚各民族。

探讨鲁迅的文化观构成，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鲁迅文化思想的建构性。因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总是会有人怀疑鲁迅文化思想的建构，认为鲁迅是有批判无建构。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对文化建构如何理解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是习惯于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去理解文化建构的，并不对建构的类型进行认真的区分。那种认为鲁迅的文化思想没有建构的倾向，其实不是站在文化学的立场来审视鲁迅的思想文化建构，而是站在政治文化思想建构的立场来看待鲁迅的，这样就造成了一种错位。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比较强，看问题的政治实用思维也比较强，他们往往拿政治家的文化思想建构来和思想家的文化建构相类比，这种类比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不科学的。的确，成功的政治家的文化思想建构总是以一种看得见的实体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比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可以显现为“中华民国”这一国家形式，毛泽东可以把他的政治文化思想贯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邓小平可以把他的经济改革思想贯彻在“经济特区”的实践中、把他的政治思想转变为“一国两制”的运行模式。这就是说，政治家的文化思想能够通过一个实体实实在在地作用于人们的生活和存在。而思想家的建构却是一种终极性的诉求，这一建构更着眼于人的精神、境界、灵魂、情操等内在层面，

① [韩]朴宰雨：《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序一》，见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

② [韩]任轩永：《我所受到的鲁迅的影响》，见朴宰雨《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收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116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

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某一种政治制度能彻底完成的，也不是某一个历史时期能够完全实现的，它需要的是一个不断的革命的过程才能达到的，而对于鲁迅来说，只有“永远革命”才能“摆脱历史的无穷无尽的重复与循环”，而始终保持“革命”态度的人势必“成为自己昔日同伴的批判者”，因为他们满足于“成功”之时，便陷入那种历史的循环——“这种循环正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终极革命对象”^①。这就意味着，思想家鲁迅的文化建构为我们提供的是方向，是终极目标，而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策。

具体说来，鲁迅的思想文化建构的目标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来展开的，其一是“立人”，其二是“动”的文化。“立人”是鲁迅在1907年于《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可以说是鲁迅文化思想建构的一个基本纲领，鲁迅一生的文化活动都是围绕这个纲领展开的。“立人”的“人”是指“个体精神自由”的“人”，“立”的道术（途径）是“尊个性而张精神”，“人立而后凡事举”（《坟·文化偏至论》），包括立国。“立人”与“立国”的关系，诚如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所分析的，“立人”（确立与保证个体精神自由）是“立国”的前提与基础，又是“立国”的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与终点（最终要建立的现代国家是“人国”）。很明显，鲁迅在思考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文明”，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时，他并非不重视“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与民主”，但他更重视与强调“人的个体生命（真实具体的个别的个体人，而非普遍的、观念中的人）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说，“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民主，是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为前提的；如果相反，以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压抑来换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与民主，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人国’）——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状态（不过是以新的奴役形式代替了旧的奴役形式），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原始的‘奴隶时代’”^②。我们还注意到，鲁迅是在“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语境中来谈“自觉至，个性张”（《坟·文化偏至论》）的，他将“个性”上升到了“宗”的高度，而不只是一般的经验性原则。鲁迅对个性主义进行了这样的价值定位：“凡一个人，其

① 汪晖：《反抗绝望》，3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② 钱理群：《绝对不能让步》，载《方法》，4~5页，1997年第10期。

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惟此自性，即造物主”（《坟·文化偏至论》）。这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定位，“他把个性自由提高到宗本的、终极的、超验的层次。这是他所以别具慧识而不同于其他启蒙者，不为复杂局面所迷惑，也不为传统的伦理主义和新的奴隶主义所同化，能将个性自由精神贯彻到底的重要的价值学原因。”^① 鲁迅后来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使用了“国民性”一词，但其基本的文化立场并没有变化，还是体现了“立人”宗旨的。鲁迅对于“人”的建构的方式是极为独特的，其最主要的方式是体现在国民性批判事业中，倘若把“立人”视为鲁迅思想的“正题”，那么，“对一切奴役人的思想、制度、文化的批判，则构成其思想的反题”^②，而“国民性”批判的逻辑起点正是在“立人”的视点上生成的^③。鲁迅虽然也有正向意义上的对“立人”的“人”观念的阐述，并且也力所能及地从事了“立人”的实践活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鲁迅是回避了正向意义上的“人”的建构的，而更主要的是从批判性的否定意义上来阐述“人”不应该如何，揭示了“人不应该如何”实质上也就阐明了“人应该如何”。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曾经指出：“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其实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一“乱”一“治”的循环。鲁迅在这里所阐明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他在此划出了一条“人”与“奴”的界线，做“人”还是做“奴隶”意味着人的自由实现与否，意味着人的个体精神确立与否。鲁迅以他的无所不至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所建立的价值尺度显然是指向前者的。毋庸讳言的是，鲁迅的立人思想体系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语境中遭遇了尴尬，“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所提出的‘立人’思想也依然不过是属于鲁迅‘个人’的思想。非但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政治权威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等的‘偏至’性倡导，伴随着伪崇高、伪民主的四处泛滥和愈演愈烈，人们对鲁迅的‘立人’思想，除了责难和诟病以外，其最‘恰当’最‘聪明’的态度和做法，也只能是避而不谈其是与非了。毫无疑问，也正是在这样的背

① 王乾坤：《立人：请循其本》，载《方法》，6 页，1997 年第 11 期。

② 高远东：《立“人”于东亚》，载《方法》，9 页，1997 年第 10 期。

③ 孙郁：《立人的途径》，载《方法》，7 页，1997 年第 11 期。

景之下，当目前的我们面临着又一个‘跨世纪’的时候，只要我们敢于睁开自己的双眼并且思维也基本正常，我们会清醒地看到：经过九十年的风风雨雨和坎坎坷坷，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巨大的牺牲，在茫茫神州的大地之上，鲁迅所理想的‘立人’的境界离我们依然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且若希望鲁迅的这个思想能够真正的成为现实，恐怕注定是很难的事情。”^① 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就要从鲁迅“立人”的观念与国家意志的“人”的观念的冲突中去寻找了。鲁迅要求的是“个体”的“人”，是“自由”的“人”，国家意志要求的是“团体”的人，是“普遍的、观念中”的“人”，这两种诉求的相遇决定了鲁迅的尴尬，甚至是悲凉。所以，那种认为鲁迅的文化思想没有建构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说鲁迅的文化思想建构没有转变为现实的文化机制，这倒是成立的。因此，有无建构是一回事，实现与否是一回事，两者不可混淆。况且，思想家为社会提供的是一种远景，是一种蓝图，我们不能以极其功利性的目的去要求一种思想的实用化。

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另一个突出建构是“动”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的静态文化相区别的。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以农为本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②。乡土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静”，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③，这就造成了“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的“孤立和隔膜”^④。另一方面，封建等级制度规定好了每个人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要安于自己的地位，做一个顺民。鲁迅的小说对这种乡土社会的特点进行了杰出的表现。“静态”的乡土社会导致了“静态”的文化精神特征，做人只能“屏息低头”，“两眼下视黄泉”，“满脸装出死相”，“毫不敢轻举妄动”，与此相反，“看天就是傲慢”，“说笑就是放肆”（《华盖集·忽然想到·五》），中国的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华盖集·北京通信》），所以，鲁迅说读中国的书“总

① 王强：《也说鲁迅的“立人”思想》，载《鲁迅研究月刊》，19页，1998年第10期。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